

意識形態？ 就業困境？過河拆橋？ ——1968年末知青大潮興起重探

• 秦 暉

摘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動因，長期以來有意識形態與就業困境二說，均有部分道理，但就1968年末知青上山下鄉的「大潮」發動而言，本文認為毛澤東掀起大潮的主要動機並非解決就業，雖然也不反對說毛澤東抱持理想主義，但是從他看重「會寧經驗」中王秀蘭這類典型，卻不理會紅衛兵聞人的主動下鄉來看，意識形態與解決就業恐怕都不能說是當時的第一動機；對紅衛兵卸磨殺驢應是他當時首先考慮的出發點；至於「縮小三大差別」就更是無從談起。這次大潮與文化大革命的轉折——從主要整官僚轉向主要整民眾，尤其是造反派——密切相關，治知青史者不可只注意「縱向背景」，而忽視「橫向背景」。

關鍵詞：知青運動 文化大革命 大李莊鄉 會寧經驗 再教育

現代中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般認為在1950年代出現「初瀾」，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大潮」，改革之初的1980年前後落幕。它直接折騰了整整一代中國人，後續影響更是至今可見，也因此成為現代中國史的一大熱點。

近十多年來，知青史研究出現一大爭論：毛澤東發動這樣一場運動，究竟是為甚麼？當初運動中強調的自然是意識形態宣傳，但改革之初當局決定結束這一運動時，則認為運動是由於經濟凋敝導致的就業困境，使「上山下鄉」成為城市畢業學生的主要出路。言下之意是：現在經濟脫困了，就不需要上山下鄉了。對於要在「不爭論」意識形態的條件下另覓新路的改革而言，這樣的解釋合情合理，也曾為嚴肅的研究者所廣泛接受。早在知青運動尚未結束的1977年，美國學者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的《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一書就認為：中國政府讓知青

下鄉的根本原因，是為了解決當時城市面臨的就業壓力^①。改革時期中國大陸知青史研究的代表作——定宜莊、劉小萌的兩卷本《中國知青史》（《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主要也是持這一觀點^②。但2004年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在其力作《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u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1980*）中則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毛澤東發動這一運動主要出於意識形態動機，為的是按馬列主義觀點讓知識份子與勞動者相結合以「培養可靠的革命接班人」^③。他還認為中國的上山下鄉受到蘇聯的影響，因為蘇聯的「大墾荒」運動中也曾把城市青年派往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做開墾工作^④。

潘鳴嘯的研究其實就是證明毛澤東自己說的動機。改革時期中國官方的「不爭論」迴避了這一動機，潘鳴嘯重新提出，當然不是要肯定毛澤東，而恰恰是要批判這一動機，指出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要為「失落的一代」悲劇負責。但在價值判斷之前，事實判斷自然更為基礎。毛澤東真的只是因為（或主要因為）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就把一代城市青年趕到鄉村？

當然，人們做事往往有多重動機，事實上伯恩斯坦和劉小萌都不會否認毛澤東有烏托邦思想，正如潘鳴嘯也不會否認文革中的中國存在就業困境。他們爭論的只是何者為主要動機？同時，長達一代人的知青運動也經歷了複雜的演變，不同時段的主要動機不會是一樣的。雖然一般認為知青下鄉自1950年代已有初瀾，但劉小萌和潘鳴嘯的書名分別有「1966-1980年」和「1968-1980」字樣，顯然他們（以及今天的多數關注者）的焦點都不在於為甚麼中國會有知青下鄉，而在於文革中知青下鄉為甚麼會突成大潮。而這個大潮恰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末發生，離開文革就不可能理解這一大潮的成因。筆者認為迄今知青史研究的缺陷在於對知青下鄉現象、中國經濟史，以及毛澤東意識形態的前後（縱向）演變梳理雖多，但對1968年文革運動的巨大轉折關注不夠。知青大潮畢竟是文革史的一部分，治知青史者不可只注意「縱向背景」，而忽視「橫向背景」。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和中國的就業困難都並非此時才有，但何以唯獨此時會掀起大潮？這是探討知青運動主要動機時不能忽視的，本文即為重探此問題而作。

一 大李莊鄉與會寧縣：兩段「最高指示」的由來

1955年7月，毛澤東正在運籌「三大改造」中最重要的一環，即以全面加速合作化為中心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他在案頭看到了一本《互助合作》小冊子——這是由當時的許昌地委書記趙天錫到北京參加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時帶去的經驗材料。時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廖魯言看到其中一篇文章〈在一個鄉裏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後，將其呈送給毛澤東閱覽。文中所謂「一個鄉」就是河南郟縣的大李莊鄉，此文寫的其實是1954年的事，那年辦合作社時缺少會計和記工員，鄉裏便動員在校讀書的農村青年回來：「全鄉在貧農和下中農